

党史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

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

(内部材料 不得翻印)

下 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金春明 (1)
“五·一六”通知剖析·····	谭宗级 (16)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谭宗级 (38)
“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	金春明 (58)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王洪模 (74)
※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周文琪 (89)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	盖 军 (129)
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问题·····	常东人 (157)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金 春 明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刮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在中国大地上横扫十年之后，随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历史性胜利而逐渐平息了。如何评价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成为摆在全党，特别是党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也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党中央已经起草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相当的篇幅着重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指导和依据。廖盖隆同志的报告，根据决议精神，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基本评价和重要事件的看法，谈了很明确的意见。下面准备就个人的体会补充谈几点意见，介绍一点情况，供同志们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前就不用说了，不管人们心里和私下是怎么想和议论的，但在公开场合只能有一种语言，就是那段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讲心里话，逐渐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看法。但是，破除长期现代迷信的桎梏需要时间，特别是还存在着“两个凡是”的严重阻挠，一时还冲不破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框子。一九七七年召开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还是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

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突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政策的落实，人们通过各种表面现象逐渐认清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正象马克思所形容过的那样：“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

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马恩选集》一卷605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实践证明，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未能反修防修，反而败坏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不仅没有发扬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反而造成现代迷信的狂热弥漫全国，封建专制恶习横行神州；不仅没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反而造成文化专制，百花凋零；不仅没有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反而败坏社会风气，破坏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人民贫困，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和它所大肆宣扬的一套极其革命的词藻相反，不仅未能加速中国的前进，反而造成了停滞和倒退。真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严酷的现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这样的“大革命”不仅不能进行多次，搞一次就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永远不能再搞了。

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文化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多次谈到文化革命的问题。他提出要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等等，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四卷357页）列宁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论合作制》《列宁选集》四卷687页）我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也多次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问题，当时的角度和内容同列宁是一致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一篇社论《文化革命开始了》（1958年6月9日）指出：“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人们在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要生产力进一步充分地得到发展，就要有文化，有技术。现在妨碍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我国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文化的落后”。搞“文化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很显然，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与此相对照，我们搞了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除了首先是从文化界开刀这一点同文化有一点联系外，哪里有一点文化革命的影子呢？！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教育倒退，文化凋零，科技落伍，道德败坏，文盲大量增加。所以，它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破坏。

名与实的出入如此之大，连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感觉到了，所以，他在一九六八年就作了一条解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么？也不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四卷111页）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等等，都是在这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吗？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变质，并不需要把它革掉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没有被资产阶级篡夺，并不需要重新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因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成了唐

吉珂德同风车作战式的主观虚构的十分荒唐的斗争。

从上可见，所谓“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政治革命，而且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革命，从本质上说，只能说是一场大动乱，一场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们党犯这个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现在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比较一致了，认识到我们党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什么叫路线错误？这些年搞得很混乱，至今还没有一种众所公认的科学的概括。从总结党的历史的角度看，是否可以说路线错误需要具备这样几点：

第一，不是在一般问题和个别方面犯错误，而是在影响革命全面的根本问题上，如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等问题上发生了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曾说过：“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上，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以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选集》四卷1284页）这五个政策，我认为都是关系到革命的根本问题。在革命根本问题上犯了原则错误，又没有及时改正，这应该是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不是实际工作的偏差，而是具有系统性的纲领性的意见和主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讲过的形成纲领、形成制度、形成政策。

第三，不是一般党员干部，而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系统的错误主张，或被党中央所接受，或虽未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恶果的。

我感到这三条是起码应该有的。如果大家同意的话，用此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那么就可以说这几方面问题都是存在的。

“文化大革命”是有党中央正式通过的纲领的，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也是有理论的，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个纲领和理论却把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搞错了。

革命的任务搞错了。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不是要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而是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政治革命，甚至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政机关夺权。“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也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是政治运动不断，但经济建设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是放到重要地位。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就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东西了。按张春桥的话说：“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也可以”，这不只是量的问题，而且是全党的工作方向问题，这点文革十年和前十年是有质的不同的。

革命的对象搞错了。荒谬地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有个党内资产阶级，主观虚构了一个敌人。结果，把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当成了革命对象，要革那些“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打击迫害了党政的各级领导干部。

革命的动力搞错了。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依靠集体农民、也不是依靠党员和干部，而是依靠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

革命的方法搞错了。不是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发扬民主，说服教育，和

风细雨，依法制，而是采取敌对的方法，粗暴的野蛮地污辱人格的错误手段，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游街示众，戴高帽子，喷气式，监禁酷刑等等，人为地激化矛盾，自相残杀。

这样的错误，而且统治党长达十年之久，如果再不是路线错误，就没有路线错误了。所以，这次错误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期地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左”倾路线和极左路线有何区别？我认为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左”倾路线就是比革命的左还要左的路线，也就是极左。所以两者没有本质上区别，那么，目前为什么还运用两个提法，我认为：一是政治的需要，两个提法有利于为全党和广大群众接受，有利于统一思想。二是表示出二者程度上客观存在的区别。例如，对刘少奇的打倒与打死，保护一批老干部与打倒一切，但这些差别都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根本态度的差别。

谁应该对这次路线错误负责？这是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同志，他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其次，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也要负责任。他们利用党犯了路线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混乱，祸国殃民，篡党窃国，罪恶滔天。他们的罪责是无法逃避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应该注意加以区别。最后，我们党也有责任。党的责任绝不应只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而应包括党中央的整体，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没有及时地纠正，没有作坚决的斗争，以至最后造成个人崇拜，破坏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无力纠正自己领袖的错误，这个责任也是无可推诿的。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阶段划分

十年动乱的历史，划为几个阶段合适，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历史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划分阶段的原则是应该同整个党史划分阶段的原则一致的，就是要从中国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为标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以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此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况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了。”

文革十年，从始至终也有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错误地主观虚构了一个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以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里夺权作为主要目的。敌人虽是虚构的，假想的，但假敌真打，一本正经地、认真地打了十年，构成了虽然荒唐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也只能以此为出发点去考察和划分阶段。同所谓“走资派”的矛盾，是十年一贯制的。但谁是“走资派”，要打倒的主要危险敌人是谁？各个阶段又

是不一样的。因此，矛盾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变化，也就反映出了阶段性。当然，这些阶段性并不是由什么人事先就规定好了的，按照一个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所造成的结果。

根据这样的观点去分析文革十年，我们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炮打司令部，全国大动乱（1966.5——1969.4）

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决定成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开始了全国大动乱。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客观地构成了一个阶段。这三年是最混乱的三年，各种大小事件接连不断，夺权反夺权斗争不休。表面上看很乱，不好理解，但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各种事件和斗争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要打倒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

《五·一六通知》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旁，正在受到我们信用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六月一日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所谓“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使大家都明白了要打倒的是谁，支持红卫兵，号召大串联，是为了发动群众，掀起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支持“一月风暴”，号召全面夺权，是为了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而当党内一批老同志起来维护党的正确政策，批评“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则出现了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斗争，无一不是围绕着“左”倾错误路线要打倒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一个矛盾而发生的。

经过二年多的激烈复杂的斗争，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十月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炮制的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决议，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同志的手续，又经过半年的筹备，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大多数地方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本身就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这次大会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高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肯定了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丰功伟绩”，使左倾错误路线利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而更完备化和合法化了。

当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同刘少奇的矛盾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个主观虚构的敌人。革命对象搞错了，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击了，那么随之而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当然全都错了。

二、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1969.5——1971.9）

林彪从一九五九年取代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就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掩盖下，大肆鼓吹个人迷信，深受毛泽东同志的赏识和信

任，被依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支臂膀。林彪野心膨胀，大搞阴谋，拉帮结派，组织大小舰队，逐渐组成了自己的反党集团。林彪集团同江青一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打倒刘少奇。但在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九大”可以说是林彪集团发展的全盛时期。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叶群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一大批干部如：王秉璋、刘丰、周赤萍、程世清、王新、王维国等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真是权势赫赫，不可一世。随着权势的增大，野心也急骤膨胀，林彪集团就急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父传子袭的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这时共同“治乱”的伙伴江青一伙，就被看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和障碍。

林彪集团的抢班夺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企图通过合法的手段，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先让林彪成为国家主席，然后再当党的主席。一九七〇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基本上走的是这一条路子。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但被挫败了，证明此路不通。第二阶段，九届二中全会后，转而采取非法的暴力手段，全党批陈整风，逐步深入，自然就牵连到黄、吴、叶、李、邱等人，这些人也都被迫作了检讨。当时虽然还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但党中央采取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无一不是针对林彪的。林彪一伙大起恐慌，认为接班人的位置岌岌可危。合法的手段行不通，就转而企图用非法的手段，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强行接班。一九七一年春，林彪指使林立果等人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571”工程纪要》。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令，但又没能得逞。阴谋败露后，林贼携带妻、子及几个死党仓惶外逃，妄图投修叛国，结果折戟沉沙，遗臭万年。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场斗争并不是原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预定要有的，而是在全国大动乱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最后矛盾转化了，逼使人们不能不进行了这样一场斗争。

三、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1971.9—1974.12）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受委托主持党政工作，他在必须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排除干扰，力抗危局，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使工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全国形势有所好转。

在这一期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和艰苦工作，外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中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中日之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文化大革命”已搞了五年多，实践效果很坏，加上林彪叛逃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破产的标志，这时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最好时机，可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坚持和“四人帮”的煽惑，错过了这一时机，使动乱继续下去。

林彪集团复天后，“四人帮”打扮成反林英雄的模样，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利用批林整风，保护和收容了一批林贼党羽，使自己的权势进一步发展。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后，成为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从此，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王洪文正式结成了“四人帮”。一九七三年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四人帮”发展的全盛时期。十大在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两面派行为，提高全党的识别能力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只能在肯定九大路线的前提下分析形势和提出任务，因此，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路线。大会选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但由于采取了个人指定接班人的错误作法，使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加上康生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他们采取圈定名单，指定代表等手段，将他们的一批亲信塞入党中央委员会，这样就使“四人帮”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且几乎控制了报刊、广播、文艺等全部舆论大权。

随着权势的膨胀，“四人帮”的政治野心倍增，他们妄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他们组阁，从而逐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一九七四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给了“四人帮”以可乘之机。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后来又经过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由他取而代之，上台执政。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同志也看到江青“积怨甚多”，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明确表示仍由周恩来同志当总理。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四人帮”这样一股势力仍然存在，只是在一次大较量中受到了挫折，所以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标题中是用了“挫败”二字。

四、全面整顿，四人帮猖狂反扑，十月的历史性胜利（1975.1——1976.10）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带病作报告，重申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会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以非凡的革命毅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克服巨大的阻力。同“四人帮”坚决斗争，批判派性，进行全面整顿，实际上在努力恢复八大的正确路线。时间虽不长，但收效显著，工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倾空想错误却有进一步的发展，集中表现就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说成“同旧社会差不多”，期望用带有小生产平均主义色彩的办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给了“四人帮”猖狂反扑以可乘之机。他们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名，宣扬“全面专政论”，鼓吹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重新工作的一大批老干部。毛泽东同志看出“四人帮”搞帮派，有野心，曾支持对他们在政治局内进行批评；但看到邓小平同志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正确政策时，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搞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批刘冰等人的上告信为由头，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乘机煽风点火，疯狂反扑，党和国家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掏尽红心为人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不得不说不说些违心之言，参与一些错误的决定，但党和人民深深地谅解他尊敬他，因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广大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沉痛悼念却受到“四人帮”的无理压制。“四人帮”的党羽公开在上海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又企图登台组阁。“四人帮”的种

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无比的义愤，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老一辈革命家，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一直在进行抵制、反抗和斗争，如抵制批海瑞罢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二月逆流”，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上海的两次炮打张春桥等等。如果说，这些还主要是采取部分群众或个别斗争形式的话，那么到一九七六年春，反抗斗争就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了。

从南京事件开始，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丙辰清明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抗议错误路线、挽救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从此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就为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年老病重的情况下，听信了错误的汇报，错误地判定了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提议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犯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但他提出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正确建议，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晚年虽然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但主观上还是为了维护革命，并且一直警惕地保卫着中国的安全。他的逝世使全国人民陷入深重的悲痛之中。

可是，“四人帮”却趁毛主席逝世之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党和人民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很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逝世，“四人帮”猖狂作乱，政治上逆风滚滚；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真是星殒山崩、党国危难，是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之年，然而结局是好的。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此又开辟了新的篇章。

这就是十年的大体轮廓。

三、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阶段。犯路线错误时间这么长，是党史上的第一次；涉及面大，损失严重，影响很深，是党史上空前的；特别是，这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和推行者，正是过去领导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深受党和人民爱戴、有极高威望的领袖，这也是历史上没有前例的。今天，我们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要实事求是地批判和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这就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也是空前的。

这段历史刚刚过去。从昨天的事情就是历史的角度看，确实已经是历史。但正

因为它是刚刚走过去的历史就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同今天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大多数仍然活着，有些人还身居领导岗位；对其中一些事件的评价，直接涉及到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之较其他阶级的历史具有更大的政治敏感性。有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到，但已经触痛了某些人，甚至是相当的领导同志。这大概也是一种风险吧。第二，也是因为事情刚刚过去，很多事情往往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真相才会完全弄清；而人们的感情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平复，才能够更冷静而客观。列宁说过：“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之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三十三卷54页）这些都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困难。

既然有如此多的困难，是否可以把这段历史先放下，不研究，留给下一代去研究呢？不行。国内和现实的现实需要，使我们决不应消极等待，而必须马上动手研究这段历史。党中央、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同志一再作这样号召，党中央当前面临的任任务，非常繁多，但却把对建国三十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花大力来抓，这都说明了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四点：

第一，研究这一段历史，有助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

我们说解放思想当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从错误的理论和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回归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从来如此的，似乎不应该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多年来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个人作用，搞个人崇拜，甚至煽动现代迷信的狂热，把个人的随便一句话或任何一个判断都称为“最高指示”，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而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永远正确，不说一句错话，每句话都代表真理的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结果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同对毛泽东思想缺乏统一的科学的理解，是有重大关系的。

造成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1.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晚年由于种种原因而发生了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脱离集体的缺点，本人坚持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上身边有一些坏人包围，因而就产生重大失误，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和言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矛盾，以致使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本身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

2.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煽动个人崇拜的狂热。他们以学习和解释毛著权威的姿态，任意断章摘取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词句，甚至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某些指示，加以夸大，推向极端，祸国殃民。这种名为推崇毛泽东思想，而实则背离毛泽东思想的阴险手法，也是造成思想大混乱的一个祸根。

3.用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在一段时间内被大肆宣扬过的“两个凡是”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恶劣

的典型。这种错误的态度，加重了人民的精神枷锁，制造了新的思想束缚和禁区，使人们拘泥于个别词句，而不能领会精神实质。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表现的集中而突出。所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分析和研究这一段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和敌我界限，总结经验，作为今日之借鉴，就必然会有助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而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

对一个党来说，指导思想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统一的理解，我们党就不能统一思想，统一步伐，高举红旗，奋勇前进。所以，这是当前一件十分迫切需要搞好的大事。

第二，研究这一段历史，才能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切近的参考。

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整个世界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很多，它们各有特点、长处，也各有其缺欠，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可以效法的典型。认真地研究吸取这方面的经验作为借鉴，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过去我们对这方面注意研究总结不够，今后需要加强。但是从根本上说，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强国，首要的是从本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找出自己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这一点外国有识之士也是看到的，比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十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就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可能沿袭任何外国的经验。你们需要确定自己的道路，采用自己的方式。”（《人民日报》1980年10月22日）。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这条道路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走了十年的大弯路，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就更值得认真总结。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完整地认识客观规律，仅仅有成功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失败的经验，只有具备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才能从比较鉴别中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恩选集》四卷458页）列宁也指出：“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来解决的：先进阶级不止一次两次的进行冲击，取得失败的经验以后才能得到胜利。”（《走向轨道》，《列宁全集》十五卷324页）我们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革命任务，我们已经具备了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从这一点说，我们的事业成功是大有希望的。

但是要使“文化大革命”这次大曲折、大失败真正变成经验，变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态度不对头，“文化大革命”也可能只是一个可怕的伤痕和痛苦的回忆，那样，高昂的学费我们白花了。我感觉有两种态度是不好的，一种是闭眼不看现实，不能勇敢地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了，不敢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甚至还要坚持已经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套错误的东西，另一种是消极悲观，丧失信心，甚至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北京有一个青年工人在回答幸福是什么的时候，竟写道，他的最大幸福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呆一分钟。当然，象这样人只是极

少数。但如不克服这两种错误态度，“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是总结不好的。什么是正确态度呢？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一段话，我认为讲得好的。他说：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无从总结，坏事就不能变成好事。看来，只有勇敢地正视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才能总结出有益的教训，以利于革命事业。

第三，研究这一段历史，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党和我们自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大动乱。正如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所形象地描写的那样：“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了一个身，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沉滓的泛起》）新中国的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当然不是一个“停滞多年的池塘”，但历次运动都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搅动得厉害，真是“史无前例”，“天翻地复”，于是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事情都出现，这样一来就给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的极好机会。

“文化大革命”曾有一个说法流传较广，就是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最彻底，反封建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总是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很少有人讲要反对封建主义复辟。可是，十年这么一折腾，大家的看法就改变了，原来反封建的任务虽然政治和经济任务方面完成了，但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又是要搞父传子的林家王朝，又要当“女皇”，什么血统论、株连九族、行帮思想、封建特权、老爷衙内，种种野蛮的惨无人道的肉刑等等，这些东西来一个大出笼，就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认识到了反对封建余毒仍是今日中国的一项迫切任务。大家群起而攻之，封建余毒就扫清有日了。

又如，五十年代流传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党人数最多，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最高，领导核心最坚强，似乎一切完美无缺，整天“光荣、伟大、正确”不离口。“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党内不仅有“走资派”，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个“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专了多年政，于是一无是处，非彻底砸烂了再“重建”不行。这么一大反复，对我们党的认识就更全面了。党确实伟大，有光荣的历史，有很多正确的决策，但也有错误，光明面是主要的，但也有阴暗面，需要一分为二。这样认识就更实际了。党中央最近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方针，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总结。这方面的事例，大家只要认真想一想，一定会举出很多的。

至于认识我们自己，每个同志都可以谈出很多体会，这里只点一个题目就够了。

第四，研究这一段历史，有利于帮助世界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发生于中国，但它的影响却遍于全世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十分关切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议论纷纷，譬如前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教授是一位多年研究苏联

经济计划问题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文革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并写了《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1974年版，观点是极左的。1977年5月11日他发表公开信，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他认为张春桥、姚文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我们粉碎“四人帮”反倒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贝特兰的辞职信发表后，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加拿大专家尼尔·伯顿写了一篇文章叫《为新政权辩护》，反驳了贝的一些观点。1978年3月贝特兰又写了一篇文章《大跃进》，对我进行了全面攻击。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任历史教授的陈志让（华人），写了一篇《“大跃进”剖析》对贝特兰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这些情况说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早就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公开的辩论了。贝特兰的观点，说明极左思潮不是一国一地的现象，值得注意。当然也有另一种，比如有一个日本记者叫柴田穗，曾经是东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1967年9月被我驱逐回国。这个人从1977年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他的专著《毛泽东的悲剧》一直到1979年5月，共六百四十回，现在已经汇集成厚厚的五大卷，而且还以“事实准确，观点有见地”而获得了日本的菊池宽奖。其实其中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完全用资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问题。香港、台湾的报刊杂志上各种评论就更多了，有些明显地在那里造谣、歪曲、攻击。他们这些东西向全世界发行，流传很广。

“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亲身参加者，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我们，可是我们都长期默不作声，至今在全国报刊上还没有什么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作。我们不说，就等于听任他们那些荒谬的东西继续影响全世界人民。当然报刊上什么时候公开讲，这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研究这段历史，实在不应该再迟迟不上马了。我想我们这一代党史工作者应该有信心和勇气，把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承担起来。

四、研究“文化大革命”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的原则同整个历史科学是一样的，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具体到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想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客观地历史地考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失败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大悲剧，这是已经引起普遍思考的大问题。在思考当中特别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防止突出个人的唯心史观。因为过去一直宣传“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把功劳完全归之于一个人。现在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过错归之于一个人。办法很简便，但是不科学。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三中全会以前，在宣传工作上也有

另外一种毛病，就是把一切罪过都加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这种作法实践证明也是失败的。中国人不信，外国人不信。有一位对华友好的外国作家就说，在中国谁犯了错误，谁就是脏纸篓，一切脏东西都往里扔。这样的宣传是失败的。前面提到那位不同意贝特兰观点的尼尔·伯顿先生，在他的《为新政权辩护》一文中也指出：“官方的《人民日报》使用不多几个月前他们遣责邓小平时曾经使用过的同样语言来描绘那四个人……是以用了多年的陈词滥调写成的……说这些东西很难减少我们思想混乱。”

（《国外思潮》第二册15页）

恩格斯在一封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恩选集》第四卷343页）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应该从他的“个人欲望中”去寻找，而应该研究他所代表的一定的历史潮流。是一种什么样的潮流呢？就是一种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基本特点的带有浓厚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的左倾思潮。“文化大革命”正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们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无庸讳言，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提法和判断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是，他每一次提出来的观点都为我们党所接受了。这样就使这左的思潮逐渐发展而难以纠正。这个左倾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当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国内条件也有国际条件。廖盖隆同志谈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很有启发。而这些正是我们要着重去分析和研究的。在讨论中有的同志对左倾空想怎么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感到不好理解，我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空想问题，从现在接触的材料中有三次比较突出：一次是五八年，以北戴河讲话和印发张鲁传为代表；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一次是七四年底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从这些讲话和指示中可以看出，它的内容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号召下，消灭商品、货币、恢复供给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而实行的办法，主要是搞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

这样的一种理想和作法是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必然要遭到党内外各种形式的抵制和反对，也得不到中央领导的赞成。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他这一套才是马克思主义，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摇摆，就是“搞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必然要人为地加剧党内矛盾。一九五八年批判了周恩来、陈云同志，五九年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同志，也波及朱德同志，六二年以后又对刘少奇同志不满，只有一个林彪被认为是忠于他的。这种情况不能不是促使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的产物，根本违反了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在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时，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但要分析个人的错误。

任何历史事件总是由一定的人去参加、领导和进行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同时，从来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而是认为指导运动的人物的个人特性、品质、思想等因素，对历史发展是起一定作用的。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时候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一卷26页）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现代迷信盛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破坏，党政军一切大权都集中于一个人，在这样情况下，个人的因素影响就比平时为大。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想法，说的一句话，都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思想和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胡乔木同志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有一种左的空想（或革命空想）的共产主义的模式，并提出“五·七指示”和“理论的指示”为例，这样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应该在分析整个错误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对于个人的功过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在我们中国有一种古老的传统，叫作“为尊者讳”。按照历史学家陈垣教授的考据：“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史讳举例》序）对于我们所尊敬的人，总是讳其过，明明错了，硬是不承认，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打圆场。这样做动机也可能是好的，是为了爱护领袖，但是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痛苦教训告诉我们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决不应该把领导人的过错隐藏起来，相反地倒是应该让群众都知道。这样，才能把领导人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是赞成的，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说：“似乎我们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为尊者讳”也是一种封建主义的陋习，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的一大障碍，应该彻底扫除掉。

第三，要排除利害和感情的干扰，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力戒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对于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尤为需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领导的错误，坏人的煽动破坏，投机者的拍马钻营，人民的反抗斗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地搅合在一起，使事物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更冷静更客观更慎重地对待每一件事物，深入调查研究，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做到这一点，当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利害和感情的干扰。“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千万人受冲击、受株连的人，据有的领导同志估计达一亿人。这一场政治运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但也不能说没有极少数人是受益者，身居领导职位，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阻碍正确评价文革。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都有个不同经历和感受，因此在分析和研究问题时，特别是同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常常不容易保持冷静和客观。同一件事，受害者和受益者的感情是不可能一样的。另外由于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看法也会不同。领导其事者和处于一般地位的人看法也可能是不同。

一致的。比如对于支左问题，我们在一个稿子上曾这样写：“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当时的全国大局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总体上错了，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破坏，三支两军工作发生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的复杂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这个稿子拿到党校学员中去讨论，就有种种不同意见。大体上是地方的同志认为评价太高了，而部队里的同志则认为对功绩估价不足。两者截然相反。

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选集》二卷1页）可见利益关系对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妨碍极大。必须排除利害和成绩的干扰，才能做到冷静的科学的分析态度，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结论。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这同样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

第四，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总结经验，增强信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是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受挫折、人民遭磨难的历史，是我们党遭受极大破坏的历史。讲胜利的历史，很容易使人欣欣鼓舞，兴高彩烈；而讲受挫折的历史，失败的历史，又常常容易使人消极埋怨，甚至垂头丧气。这种情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党史工作者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通常是依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列宁选集》一卷715页）毛泽东同志也教导我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至今仍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仍在通过实践而不断完善过程之中，在从事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不经历艰难曲折，不冒各种风险，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设想的。当然，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期的路线错误是应该力求避免的。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曾谈到这样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给我们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路究竟怎么走，那要靠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去解决。在这种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每一个单独的具体的实践，都可能是不完整的，有错误的，甚至走了弯路。但如果没有这每一个单独的有缺点实践，就不能实现完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重障碍而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全集》二十八卷54页）

马克思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主义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能够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潮流，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的历史，同样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